

主编 李天纲  
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 
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·政治学（第一辑）

# 民主真谛

〔英〕勒未斯（E. Reves）著 赵增辉 译


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 
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Press

主编 李天纲  
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 
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·政治学（第一辑）

# 民主真谛

〔英〕勒未斯（E.Reves）著 赵增辉 译


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 
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Press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民主真谛/(英) 勒未斯 (Reves, E.) 著; 赵增辉译. —上海: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, 2016

(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/李天纲主编. 政治学)

ISBN 978-7-5520-1258-3

I. ①民… II. ①勒… ②赵… III. ①民主政治—研究 IV. ①D08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061942号

## 民主真谛

主 编: 李天纲

编 纂: 赵 炬

责任编辑: 唐云松

特约编辑: 陈宁宁

封面设计: 清 风

策 划: 赵 炬

执 行: 取映文化

加工整理: 嘎 拉 江 岩 牵 牛 莉 娜

责任校对: 笑 然

出版发行: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上海顺昌路622号 邮编200025

电话总机: 021-63315900 销售热线021-53063735

<http://www.sassp.org.cn> E-mail: [sassp@sass.org.cn](mailto:sassp@sass.org.cn)

排 版: 上海永正彩色分色制版有限公司

印 刷: 常熟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650×900毫米 1/16开

字 数: 120千字

印 张: 11.5

版 次: 2016年9月第1版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520-1258-3/D.373

定 价: 62.00元(精装)

# 民国西学：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

——『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』序

李天纲

继唐代翻译印度佛经之后，二十世纪是中文翻译历史上的第二个高潮时期。来自欧美的『西学』，以巨大的规模涌入中国，参与改变了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，这在人类文明史上也是罕见的。域外知识大规模地输入本土，与当地文化交流信息，激发思想，乃至产生新的理论，全球范围也仅仅发生过有数的那么几次。除了唐代中原人用汉语翻译印度思想之外，公元九、十世纪阿拉伯人翻译希腊文化，有一场著名的『百年翻译运动』之外，还有欧洲十四、十五世纪从阿拉伯、希腊、希伯来等『东方』民族的典籍中翻译古代文献，汇入欧洲文化，史称『文艺复兴』。中国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大量翻译欧美『西学』，可以和以上的几次翻译运动相比拟，称之为『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』、『中国的文艺复兴』并不过分。

运动似乎是突如其来，其实早有前奏。梁启超（1873-1929）在《清代学术概论》中说：『自明末徐光启、李之藻等广译算学、天文、水利诸书，为欧籍入中国之始。』利玛窦（Matteo Ricci, 1552-1610）、徐光启、李之藻等人发动的明末清初天主教翻译运动，比清末的『西学』早了二百多年。梁启超有所不知的是：利、徐、李等人不但翻译了天文、历算等『科学』著作，还翻译了诸如亚里士多德《论灵魂》（《灵言蠡勺》）、《形而上学》（《名理探》）等神学、哲学著作。梁启超称明末翻译为『西学东渐』之始是对的，但他说其『范围亦限于天（文）、（历）算』，则误导了他的学生们一百年，直到今天。

从明末到清末的『西学』翻译只是开始，而且断断续续，并不连贯成为一场『运动』。各种原因导致了『西学』的挫折：被明清易代的战火打断；受清初『中国礼仪之争』的影响；欧洲在1713年禁止了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，以及儒家保守主义思潮在清代的兴起。鸦片战争以后很久，再次翻译『西学』，仍然只在上海和江南地区。从翻译规模来看，以上海为中心的翻译人才、出版机构和发行组织都比明末强大了，影响力却仍然有限。梁启超说：『惟（上海江南）制造局中尚译有科学书二十种，李善兰、华蘅芳、赵仲涵等任笔受。其人皆学有根底，对于所译之书责任心与兴味皆极浓重，故其成绩略可比明之徐、李。』梁启超对清末翻译的规模估计还是不足，但说『戊戌变法』之前的『西学』翻译只在上海、香港、澳门等地零散从事，影响范围并不及于内地，则是事实。

对明末和清末的『西学』做了简短的回顾之后，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：二十世纪的中文翻译，或曰中华民国时期的『西学』，才是称得上有规模的『翻译运动』。也正是在二十世纪的一百年中，数以千计的『汉译名著』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必读教材。1905年，清朝废除了科举制，新式高等教育以新建『大学堂』的方式举行，而不是原来尝试的利用『书院』系统改造而成。新建的大学、中学，数理化、文史哲、政经法等学科，都采用了翻译作品，甚至还有西文原版教材，于是，中国读书人的思想中又多了一种新的标杆，即在『四书五经』之外，还必须要参考一下来自欧美的『西方经典』，甚至到了『言必称希腊、罗马』的程度。

我们在这里说『民国西学』，它的规模超过明末、清末；它的影响遍及沿海、内地；它借助二十世纪的新式教育制度，渗透到中国人的知识体系、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中，这些结论虽然都还需要论证，但从一般直觉来看，是可以成立的。中国二十世纪的启蒙运动，以及『现代化』、『世俗化』、『理性化』，都与『民国西学』的翻译介绍直接有关。然而，『民国西学』到底是一个多大的规模？它是一

个怎样的体系？它们是以什么方式影响了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？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得到认真研究，我们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。还有，哪些著作得到了翻译，哪些译者的影响最大？『西学东渐』的代表，明末有徐光启，清末有严复，那『民国西学』的代表作在哪里？这一系列问题我们并不能明确地回答，原因就在我们对民国翻译出版的西学著作并无一个全程的了解，民国翻译的那些哲学、社会科学、人文学科的『西学』著作，束之高阁，已经好多年。

举例来说，1935年，上海生活书店编辑《全国总书目》，『网罗全国新书店、学术机关、文化团体、图书馆、政府机关、研究学会以及个人私家之出版物约二万种』。就是用这二万种新版图书，生活书店编制了一套全新分类，分为：『总类、哲学、社会科学、宗教、自然科学、文艺、语文学、史地、技术知识』。一瞥之下，这个图书分类法比今天的『人大图书分类法』更仔细，因为翻译介绍的思潮、学说、学科、流派更庞大。尽管并没有统一的『社科规划』和『文化战略』，『民国西学』却在『中国的文艺复兴』运动推动下得到了长足发展。查看《全国总书目》（上海，生活书店，1935），在『社会科学·社会学一般·社会主义』的子目录下，列有『社会主义概论、社会主义史、科学的社会主义、无政府主义、基尔特社会主义、乌托邦社会主义、基督教社会主义、议会派社会主义』等；在『社会科学·政治·政体政制』的子目录下，列有『政治制度概论、政治制度史、宪政、民主制、独裁制、联邦制、各种政制评述、各国政制、中国政制、现代政制、中国政制史』等，翻译、研究和出版，真的是与欧美接棒，与世界同步。1911年以后的38年的『民国西学』为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打下了扎实的基础，而我们却长期忽视，不作接续。

编辑出版一套『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』，把中华民国在大陆38年期间翻译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著作重新刊印，对于我们估计、认识和研究『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』、『中国的文艺复兴』，接续当

时学统，无疑是有着重要的意义。1980年代初，上海、北京的学术界以朱维铮、庞朴先生为代表，编辑『中国文化史丛书』，一个宗旨便是接续1930年代商务印书馆王云五主编『中国文化史丛书』，重振旗鼓，『整理国故』，先是恢复，然后才谈得上去超越。遗憾的是，最近三十年的『西学』研究却似乎没有采取『接续』民国传统的方法来做，我们急急乎又引进了许多新理论，诸如控制论、信息论、系统论……还有『老三论』、『新三论』、『后现代』、『后殖民』等等新理论，对『民国西学』弃之如敝屣，避之唯恐不及。

民国时期确实没有突出的翻译人物，我们是指像严复那样的学者，单靠『严译八种』的稿酬就能成为商务印书馆大股东，还受邀担任多间大学的校长，几份报刊的主笔。但是，像王造时（1903-1971）先生那样在『西学』翻译领域做出重要贡献，然后借此『西学』，主编报刊、杂志，在『反独裁』、『争民主』和『抗战救国』等舆论中取得重大影响的人物也不在少数。王造时的翻译作品有黑格尔的《历史哲学》、摩瓦特的《近代欧洲外交史》、《现代欧洲外交史》、拉铁耐的《美国外交政策史》、拉斯基的《国家的理论与实际》、《民主政治在危机中》。1931年，王先生曾担任光华大学教授，文学院院长，政治系主任，后来创办了《主张与批评》（1932）、《自由言论》（1933），组织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』（1932）。他在上海舆论界发表宪政、法治、理性的自由主义，他在大学课堂上讲授的则是英国费边社社会主义、工联主义和公有化理论（见王造时著《荒谬集·我们的根本主张》，1935，上海，自由言论社）。非常可惜的是，王造时先生这样复杂、混合而理想主义的政治学理论和实践，在最近三十年的社会科学、人文学科中并无讨论，原因显然是与大家不读，读不到，没有再版其作品有关。

我们说，『民国西学』本来是一个相当完备的知识体系，在经历了一个巨大的『断裂』之后，学者并没有好好地反省一下，哪些可以继承和发展，哪些应该批判和扬弃。民国时期好多重要的翻译著作，我

们都没有再去翻看，认真比较，仔细理解。『改革、开放』以后，又一次『西学东渐』，大家只是急着去寻找更加新颖的『西学』，用新的取代旧的，从尼采、弗洛伊德……到福柯、德里达……就如同东北谚语讽刺的那样：『熊瞎子掰包谷，掰一个丢一个。』中国学者在『西学』宝库中寻找更新式的装备，在层出不穷的『西学』面前特别害怕落伍。这种心态里有一个幻觉：更新的理论，意味着更确定的真理，因而也能更有效地在中国使用，或者借用，来解决中国的问题。这种实用主义的『西学观』，其实是一种懒惰、被动和浮躁的短视见解，不能积累起一个稍微深厚一点的现代文化。

讨论二十世纪的『西学』，一般是以五四『新青年』来代表，这其实相当偏颇。胡适、陈独秀等人固然在介绍和推广『西学』，倡导『启蒙』时居功至伟，但是『新文化运动』造成不断求新的风气，也使得这一派的『西学』浅尝辄止，比较肤浅，有些做法甚至不能代表『民国西学』。胡适先生回忆他们举办的《新青年》杂志，有一个宗旨是要『输入学理』，即翻译介绍欧洲的社会科学、人文学科知识，他还大致理了一个系统，说『我们的《新青年》杂志，便曾经发行过一期『易卜生专号』，专门介绍这位挪威大戏剧家易卜生，在这期上我写了首篇专论叫《易卜生主义》。《新青年》也曾出过一期『马克思主义专号』。另一个《新教育月刊》也曾出过一期『杜威专号』。至于对无政府主义、社会主义、共产主义、日耳曼意识形态、盎格鲁·萨克逊思想体系和法兰西哲学等等的输入，也就习以为常了。』（唐德刚编译：《胡适口述自传》，北京，华文出版社，1992年，第191页）。胡适晚年清理的这个翻译目录，就是那一代青年不断寻找『真理』的轨迹。三四十年间，他们从一般的人性论学说，到无政府主义、社会主义、马克思主义；从不列颠宪政学说，到法兰西暴力革命理论、德意志国家主义思想，再到英格兰自由主义主张，大致就是『输入学理』运动中的全部『西学』。

胡适一语道破地说：『这些新观念、新理论之输入，基本上为的是帮助解决我们今日所面临的实际

问题。」胡适并不认为这种「活学活用」、「急用先学」的做法有什么不妥。相反，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接受「西学」的方法论，大多认为翻译为了「救国」，如同进口最新版本的克虏伯大炮能打胜仗，这就是「天经地义」。今天看来，这其实是一种庸俗意义的「实用主义」，是生吞活剥，不加消化，头痛医头，脚痛医脚的简单思维，或曰：是「夺他人之酒杯，浇自己之块垒」。从我们收集整理「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」的情况来看，「民国西学」是一个比北大「启蒙西学」更加完整的知识体系。换句话说，我们认为「五四运动」及其启蒙大众的「西学」并不能够代表二十世纪中国西学翻译运动的全部面貌，在北大的「启蒙西学」之外，还有上海出版界翻译介绍的「民国西学」。或许我们应该把「启蒙西学」纳入「民国西学」体系，「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」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。

我们认为：中国二十世纪的西学翻译运动，为汉语世界增加了巨量的知识内容，引进了不同的思维方式，激发了更大的想象空间，这种跨文化交流引起的触动作用才是最为重要的。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变得不古不今，不中不西，并非简单的外来「冲击」所致，而是由形形色色的不同因素综合而成。外来思想中包含的进步观点、立场、方案、主张、主义……具有普世主义的参考价值，但都要在理解、消化、吸收后才能成为汉语语境的一部分，才会有更好的发挥。在这一方面，明末徐光启有一个口号可以参考，那便是「欲求超胜，必须会通；会通之前，必先翻译」。反过来说，「翻译」的目的，是为了中西文化之间的融会贯通，而非搬用；「会通」的目的，不是为了把新旧思想调和成良莠不分，而是一种创新——「超胜」出一种属于全人类的新文明。二十世纪的「民国西学」，是人类新文明的一个环节，值得我们捡起来，重头到底地细细阅读，好好思考。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邀我主编「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」，献弁言于此，是为序。

「英」勒未斯（E.Reves）著 趙增輝 譯

# 民主真諦

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月初版

## 序

本書原名 A Democratic manifesto，英人 Emery Reeves 作，一九四三年倫敦 Jonathan Cape 書店出版。

民主宣言之主旨，在扶發過去民主政治之失，匡以新義，補其闕陋；並呼籲世人協力共建民主世界之新秩序，以奠定人類萬世無疆之福。蓋作者執筆之時，正大戰方酣，民主前途，不絕如縷；二十年間之奇變，歷歷在目，所感甚深，故所言彌切也！

方今海內上下，憬然相期以民主，大勢所趨，應無瞻顧。顧積數千年專制之漸，聚數萬萬蚩蚩之氓，一旦還政於民，治之在我；於民主之真義，不可不洞悉；於民主之得失，尤不可不明辨。則此民主古國之學人，本其國家及個人之經驗，苦思猛省而得之新著，正吾人及時之艾；知國人必胸虛懷體味，善爲抉擇，並於其民主世界之呼籲，樂共起而響應之也！

三十四年歲杪，趙增輝誌於陪都。

# 目次

|     |       |    |
|-----|-------|----|
| 第一章 | 人或原則  | 一  |
| 第二章 | 自由    | 一四 |
| 第三章 | 自由主義  | 二一 |
| 第四章 | 國家    | 三三 |
| 第五章 | 國家主義  | 四一 |
| 第六章 | 主權    | 五八 |
| 第七章 | 和平    | 六七 |
| 第八章 | 戰爭    | 八一 |
| 第九章 | 不干涉主義 | 八九 |

|      |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十章  | 中立·····     | 九五  |
| 第十一章 | 獨立·····     | 一〇一 |
| 第十二章 | 相互依存·····   | 一〇八 |
| 第十三章 | 武力·····     | 一一六 |
| 第十四章 | 侵略行爲·····   | 一二三 |
| 第十五章 | 防制的戰爭·····  | 一三二 |
| 第十六章 | 烏托邦的理想····· | 一三八 |
| 第十七章 | 原則與制度·····  | 一四八 |

# 民主真諦

## 第一章 人或原則

黷武主義，獨裁國家全面潰敗後的二十年，世界又在耐受着同一獨裁黷武的力量所施行的歷史上最大的襲擊。民主主義，民主國家獲得最大勝利後的二十年，民主政治重又迫處於全線的防禦。歐洲大陸上所有的民主國家，都已相率被征服或是被消滅掉了。世界上兩個最有力的單位——不列顛聯合王國和美利堅合衆國，被迫着動員全部的資源，從事防禦，以期不致爲反民主的力量所擊敗；而那些反民主的力量，却正是二十年前爲他們所打倒的。

在那二十年間究竟遭遇過些什麼呢？

一九一八年戰勝之後，民主的愛好自由的國家，原曾取得這個星球上的充份管制和絕對權力；那些威脅民主國家的安全與和平的力量，比起一個有組織的國家內，慣於威

脅個人安全與公共秩序的少數罪犯，並不強過。

每個人渴慕着和平，每個人期待着武裝的解除，每個人希望着有個更廣泛自由的國際貿易，每個人翹盼着一個較好組織的國際經濟生活，足以保障每個國家，每個人獲致較前爲多的財富與較前爲大的安全。技術上的進步，也使這些希望，似乎都在事實的可能範圍之內。這些願望的支持力量和反對力量是十與一之比——甚或是五十與一之比。然而，另一方面，却也是事實；從一九三〇年以降，年復一年，月復一月，你們又逐漸朝着軍備的擴張、敵對的尖銳、貧困的增加、商業的萎縮，朝着偏執、迫害、獨裁、軍國主義，朝着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路上走去。

一個青年人，他所受的整個教育是本諸一九二〇年到二九年間的願望，他逐步地緊隨着導引至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歷次事件；除非他已曾全然誤中於煽動的羣衆運動家們底零碎宣傳，對於這種迷離惆恍的發展過程，他是很難了解的；即使他願作深思，也不曉得從何想起；除了承認他對於這個世界一無所知，便只好回味過去在學校裏所熟誦的辭句——即一六四八年瑞典首相奧森史脫拉（Oxenstierna）送他的兒子去威斯法里亞（Westphalia）充任全權公使的時候所說的話，「孩子，你將看到統治，這個世界的

智慧是多麼渺小啊」。這位青年想到這裏，必會恐怖地自問道：「設若統治這個世界的果真是這樣微小的智慧，那麼這微小的智慧又在那裏呢？」

從一九二〇到一九四〇年，在這短短的期間，民主政治急遽地衰落，幾於臨近了不幸的收場。解釋這種事態的最簡單方法，便是向干犯了最大錯誤的一輩政治家們，一一提起控訴：我們每喜爲了墨索里尼的出現，而指責尼梯（Nitti）與法克它（Fascia）等自由黨人統治的無能。爲了希特勒的出現，而指責威瑪共和國（Weimar Republic）的屬弱。我們慣於指斥老格（Lodge）、波拉（Borah）、里得（Reed）、以及其他孤立派的上議員們，爲了他們埋伏地雷於國際聯盟之中，甚至國聯成立以前，便已預爲埋下。我們慣於責罰克里孟梭（Clemenceau）、樸音卡（Poincare）、以及其他法蘭西國家主義者們，爲了他們阻止德國境內民主力量的增長。我們以爲奧斯汀，張伯倫爵士（Sir Austen Chamberlain）和英國的保守黨份子應付日內瓦草約（Geneva Protocol）失敗的責任。我們相信麥克唐納（Mac Donald）、包爾溫（Baldwin）、和韓實生（Henderson）應負英國軍備縮減與衰弱的責任。我們想來，皮蘇斯基（Pilsudski）、及貝克（Beck）應爲東洛卡諾（East Locarno）的失敗而受譴責。我們曾爲阿比西尼

亞(Ethiopia)的受屬與國聯的怠工，而斥責霍爾(Sirsamne Heare)和賴伐爾(Pierre Laval)。我們想來，納維爾，張伯倫(Neville Chamberlain)、達拉第(Daladier)、與龐納(Georges Bonnet)應是慕尼黑案件的罪犯。我們常指責勃倫(Leon Blum)、和考特(Pierre Cot)，爲了法國武裝力量的削弱。我們又常指責林白(Charles Lindbergh)、悔樓士議員(Senator Wheeler)、賴義(Nye)、祥生(Johnson)、以及其他人員，致美國孤立主義盛行，不能早作適當的準備，以應付外來的襲擊。

這一班人自應負其責任，但其責任究有限度。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，這一奇特時期所發生的事件，其中嚴格的邏輯，便非個人責任所能解釋。因爲那班政治家竟沒有一位能控制這些事件，或領導他底國家；他們是受更大的力量所控制所領導，好些事例足以爲證。當英法兩國的輿論反對霍爾與賴伐爾關於阿比西尼亞糾紛的政策，他們底政敵，艾登。(Anthony Eden)和德賓士(Yvon De bos)便起而伐之；而在阿比西尼亞事件發生後沒有多久，這羣強國之間又發生另一糾紛——西班牙的「內戰」；這次糾紛，在國際方面引起了極大的反響，而艾登和德賓士則恰恰犯了和前任——霍爾與賴伐爾——所犯的同樣的錯誤，他們以前對之猛烈攻擊的錯誤；他們又恰恰採取了和前任所採